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

摘要

通过提高权利、资源
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

世界银行 2000

经济学院图书馆

913.68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通过提高权利、资源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

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

摘 要

世 界 银 行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致 读 者

这本册子是《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通过提高权利、资源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一书的摘要，也包括了该书的目录。

报告全文将由世界银行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如需订购，请填写手册后附的表格。

欲进一步了解有关本报告的信息，或获取有关《工作论丛》，请访问：www.worldbank.org/gender/prr。

政策研究报告制定小组

政策研究报告由伊丽莎白·金 (Elizabeth M. King) 和安德鲁·麦森 (Andrew D. Mason) 执笔, 艾南亚·巴苏 (Ananya Basu)、泰卢坦 (Tai Lui Tan)、克劳迪亚·蒙特尼格罗 (Claudio E. Montenegro) 和王丽红 (Lihong Wang) 负责编辑和分析数据、绘制图表、撰写说明文字和附录内容, 并且开展背景调查。布兰克·约万诺维奇 (Branko Jovanovic)、克里斯蒂娜·埃斯特拉达 (Cristina Estrada) 和欧文·哈盖 (Owen Haaga) 提供了其它研究帮助。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凯伦·迈森 (Karen O. Mason) 和林·斯夸尔 (Lyn Squire) 共同指导。

行政支持小组由简·斯维尼 (Jane Sweeney) 和安娜·玛丽·玛拉农 (Anna Marie Mara? on) 领导, 得到了伯利·明斯 (Polly Means)、道恩·巴兰泰恩 (Dawn Ballantyne)、以及发展研究小组和社会性别发展小组内部若干成员的协助和支持。其中, 苏珊·拉扎兹 (Susan Razzaz) 协助了对政策研究报告草案展开的讨论, 芝田世代子 (Kayoko Shibata) 和赵青华 (Qinghua Zhao) 给予了技术支持, 莉莉安娜·朗戈 (Liliana Longo) 和帕特里西亚·赛德尔 (Patricia Sader) 在预算及合同的监督方面也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布鲁斯·罗斯-莱尔森 (Bruce Ross - Larson)、梅塔·德·克奎雷蒙特 (Meta de Coquereaumont)、莫里·罗曼 (Molly Lohman) 以及通讯发展公司的艾里森·史密斯 (Allison Smith) 对报告章节进行了编纂。报告的研究、设计、编辑、出版和发行由世界银行出版司统一领导和管理。

摘 要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性别歧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近几十年来，社会性别平等虽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各国和各地区社会性别歧视在性质和范围上虽大相径庭，但其种类却都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里，女性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与男性平等地享受法律、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在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权利和政治舆论等方面，社会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妇女和女童是这种不平等的直接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广泛波及全社会，最终损害到每一个人。

鉴于上述原因，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其本身也成为发展的一个目标。它可以增强国家发展实力，减少贫困，提高管理效益。因此，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成为使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全人类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为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提供了诸多途径。全球大量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但是发展本身并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同时还需要制度保障为男女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制定政策和措施来纠正始终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项报告讨论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步战略。

- *改革制度，为男女建立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为实现权利和机会的社会性别平等，有必要改革法律和经济制度。鉴于很多国家的法律仍然体现了不平等的男女权利，因此需要进行法律改革，特别是进行《婚姻法》改革，反对家庭暴力，保障土地权、就业权和政治权。

- *加强经济发展以鼓励资源共享和平等参与意识。*

收入的提高和贫困的缓解减少了教育、卫生、营养方面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的就业机会常常使社会性别就业形势得以改观。水、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上的投资同样减少了社会性别在工作负荷上的不平等。

- *采取积极措施以纠正持续存在于资源支配和政治言论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因为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未必能充分或立竿见影地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因此仍需要在短期到中期采取积极的措施。

权利、资源和言论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

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形成的两性分工、社会习得的行为模式以及对两性分别寄予的期望。男女在生理上有所不同，但所有文化都将这些内在的生理差异解释和发展成为一系列社会期望，主要是关于哪些是适当的行为和活动，哪些是两性所具有的权利、资源和权力。在不同社会，这些期望有很大差异，但也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几乎所有的社会都认为照顾幼儿和儿童是妇女和女童的主要责任，而男人的责任则是服兵役，保家卫国。

像种族、民族和阶级一样，社会性别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大致奠定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机遇，影响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参与。尽管一些社会没有种族或民族划分，可是所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社会性别上的不对称——差异和不平等。虽然这些不对称的变化速度通常是缓慢的，但却远远不是静止的。事实上，有些时候，它们在一定的政策和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性别平等”一词在社会不同发展状况下有多种定义。政策研究报告将“社会性别平等”定义为法律规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包括平等获得劳动报酬和平等使用人力资源以及其它提供机会的生产性资源）和言论的平等（指能够影响和促进发展进程）。“社会性别平等”一词在报告中尚未被定义为收入的平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在寻求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是平等意味着男女依据个人喜好和目的享有选择不同（或相同）工作和收入的自由。

政策研究报告采用各种形式的数据和分析方法讨论有关跨越发展中世界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但是从多方面衡量和评定社会性别不平等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而且在社会性别平等的若干重要方面缺乏针对两性分门别类的数据和分析也的确是一个障碍。与相对落后的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能够占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性证据，因此，报告也回顾了工业化国家的心得。报告从微观角度、国家层面和跨国层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根据几条社会科学法则对实际工作加以了审核。

虽有进展，但社会性别不平等仍在各国存在

二十世纪后半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的绝对地位和社会性别平等都取得了巨大进

步。

- 除个别情况外，女性教育水平取得了显著提高。在南亚、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中东以及北非，女童的小学入学率翻了一番，比男童入学率的上升速度还要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两性在学校教育上存在的鸿沟。

- 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寿命提高了 15 到 20 岁。随着对不同年龄女童和女性投入的增加和对医疗保障的更充分利用，在所有发展中地区出现了对两性寿命预计的生物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亚女性人均寿命首次高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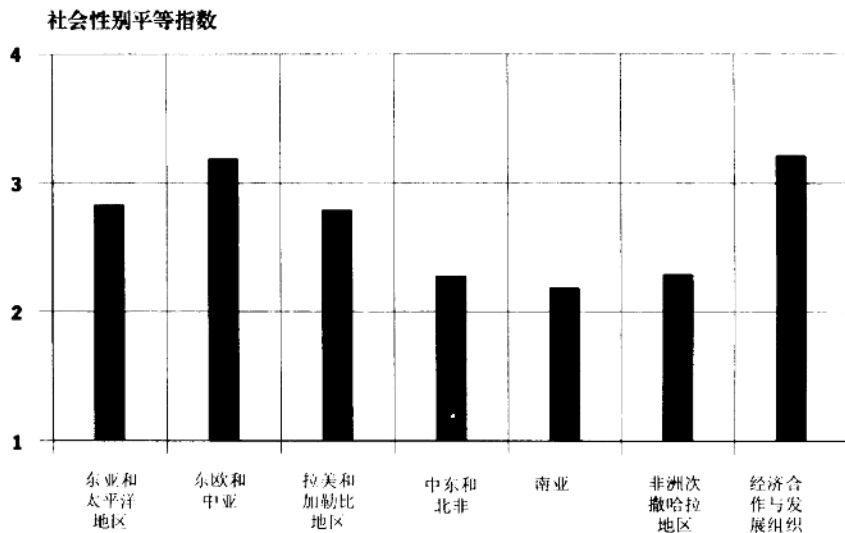
- 更多女性成为劳动力。从 1970 年起，东亚和拉丁美洲女性的就业率平均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高于男性就业率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少了两性在就业问题上的差距。工资上的社会性别差距也相应得以缩小。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各发展中国家在权利、资源和言论方面仍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很多地区，进展的速度缓慢，参差不齐。除此之外，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波动导致种种挫折，危及到经艰苦奋斗才取得的成果。

权利

没有一个地区的男性和女性能够拥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权利（图 1）。在相当一部分国家里，妇女没有独立占有土地、管理财产、开展贸易的权利，甚至没有丈夫的同意就不能出游。在非洲亚撒哈拉大部分地区，妇女主要是在婚姻维系的前提下，通过丈夫获得土地权，一旦离婚或丧偶，她们就常常失去这些权利。权利上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使妇女在生活很多方面原本能够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受到束缚——这通常大大限制了她们参与发展的能力或从中受惠。

图1 基本权利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在所有地区始终存在



注：数值1显示了权利方面社会性别平等的最低水准，数值4显示了最高水准（详见概论结尾注释1）。

来源：Humana（1992）权利数据；世界银行人口数据（1999d）。

资源

女性对教育、土地、信息、财政资源等生产性资源的支配在整体上一直比较薄弱。在南亚，妇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是男子的一半，而女童在中学的入学率只占男童的三分之二。很多妇女不能拥有土地，即使具有拥有权的妇女，一般来说，也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在很多发展中地区，女性开办的企业相对男性来说往往资金不足，对机械、化肥、外部信息及贷款的使用权较小。这些在教育和其它生产性资源中的不平等影响了妇女参与发展以及协助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能力，并在老龄阶段和经济波动时转化为使个人或家庭面临危机的更大危险性和受伤害的可能性。

近年来，女性在受教育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具有同样教育和工作年限的情况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仍然比男性少。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只能从事有限的几个固定的职业，并基本上与正式部门中的管理职位无缘。工业国家的妇女，其收入平均是男子的77%，发展中国家是73%，而只有5%的工资差距可以通过教育、工作经验或工作性质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解释。

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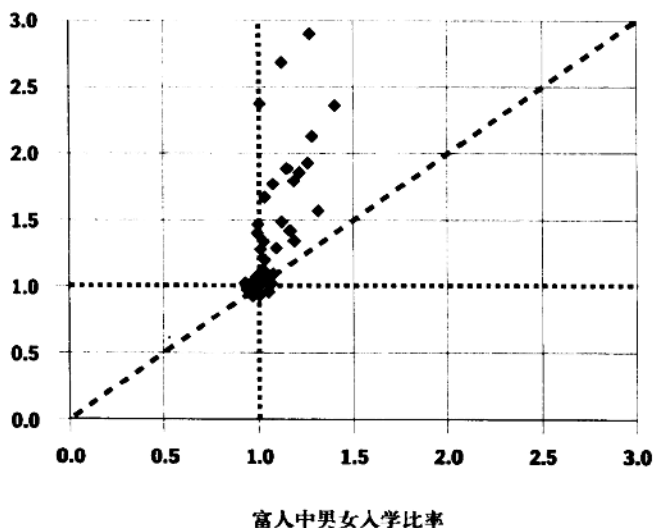
不管是自办企业还是受雇于人，妇女对资源的使用有限，赚取收入的能力较弱，这都束缚了她们在家庭中影响资源分配和投资决定的权力。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不平等权利和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样限制了她们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在国家和地区议会中，妇女代表人数严重不足，在国会中只占有平均不到10%的席位（除东亚以外，其百分点是18-19%）。在所有发展中地区，部委职位上的女性人数均未达到8%。不仅如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大多数地区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东欧自经济和政治转型过程开始以来，女性代表人数比例就从25%下降至7%。

贫穷人口中社会性别差异趋于最大

教育和卫生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在贫穷人口中往往最大。最近对41个国家青少年的入学人数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国家范围内，贫穷人口入学率的社会性别差异比非贫穷人口要高（如图2）。5岁以下的婴幼儿死亡率在贫穷人口与非贫穷人口之间也有同样显示。

图2 社会性别差异在贫困人口中相对较大

穷人中男女入学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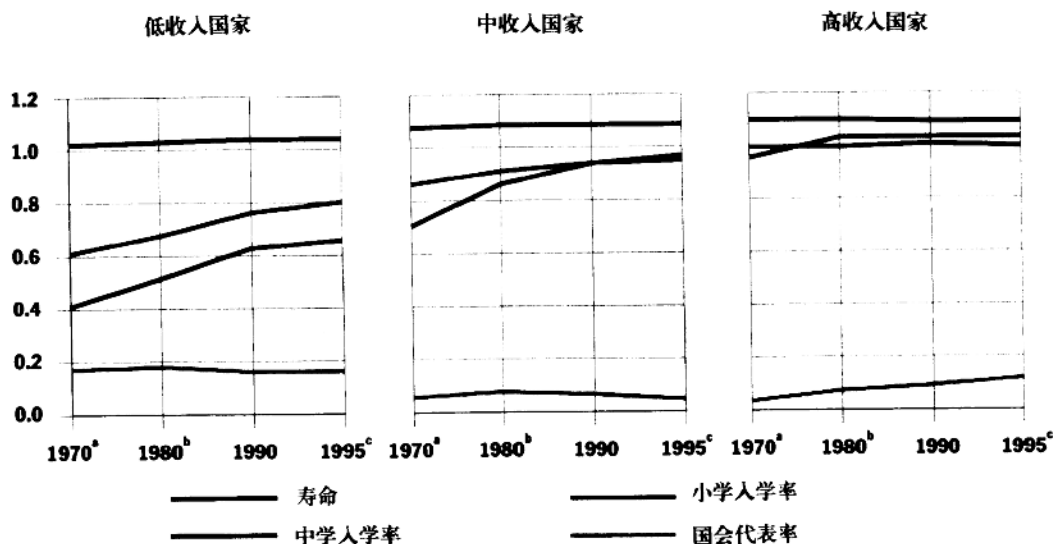
注：入学率涉及6-14岁在校儿童的比例，不考虑入学水平。贫困家庭被定义为“财富”分配底层40%的家庭；富裕家庭指从高往底20%的家庭。45度斜线指贫富间相等的社会性别差距。

资料来源：Filmer 1999。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于贫富国家的比照。近30年来，在当今的低收入国家，社会性别平等在教育 and 卫生领域取得了另人瞩目的进步，但在这些国家，男女入学差异仍然比中、高收入国家要严重（图3）。尽管社会性别平等与经济发展有一定联系，但妇女在国会中所占席位仍然很少。中国和乌干达等一些低收入国家作了很大努力，向妇女开放全国代表大会席位，使妇女代表人数超出高收入国家，显示了社会强制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潜在作用。

图3 社会性别平等在低、中收入国家逐渐取得进步——政治参与除外

女性对男性比率



注：总入学率指的是特定学年中按照学校级别总入学人数占官方学龄人数的百分比，年龄因素不考虑在内。男女入学比例指女性入学总人数除以男性入学总人数的结果。国会代表指男女所占席位的比率。所有数值都是人口加权数值。

a. 国会数据从 1975 年起。

b. 国会数据从 1985 年起。

c. 人口寿命数据从 1997 年起。

来源：WISTAT (1998) 国会数据；世界银行 (1999d) 收入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数只不过是关于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些可衡量的标志物。为了更好地了解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差距，还需要包括从实物和金融资产的控制到自主权以及其它方面的系统信息。

社会性别不平等危及大众福祉，阻碍社会发展

社会性别不平等迫使男人、女人和儿童为健康和幸福付出昂贵的代价，并影响其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除了人们自身的代价以外，社会性别不平等还降低了农业及企业的生产

力，从而影响到减少贫困，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景。此外，社会性别不平等还削弱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影响到发展政策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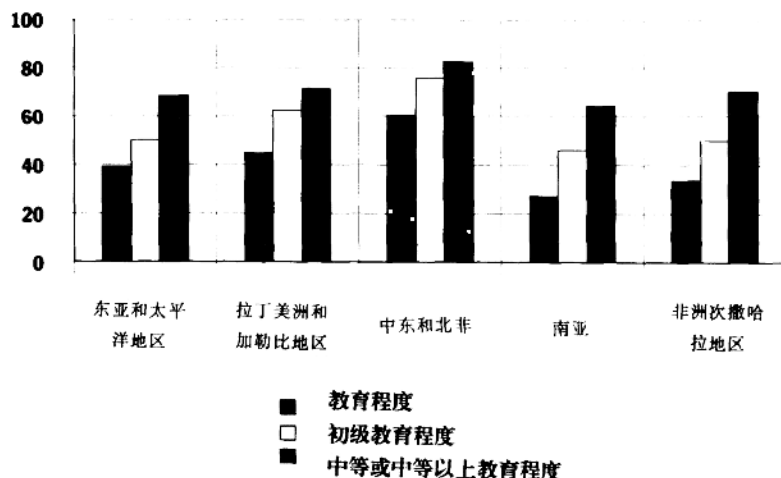
福祉

人们为社会性别不平等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全方位确定和衡量这些代价比较困难——但是世界各国的大量证据显示，顽固存在大规模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要遭受更为严重的贫困、营养失调、疾病以及其它损失。

- 中国、韩国和南亚的女婴死亡率极高。为什么？偏好男孩的社会传统导致儿童的死亡率中女童高于男童。一些评估显示，迄今已有6千万到1亿的女性死于社会性别歧视。

- 母亲没有文化和缺少学校教育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缺乏教育导致对孩子抚养质量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及营养不良。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更容易采取合适的促进健康的行为方式，例如让孩子接种疫苗（图4）。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对各家各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解释了其它促进婴幼儿养护及健康的因素。

图4 儿童免疫率与母亲教育程度提高成正比
12-23个月接受免疫的儿童与母亲教育水平的比照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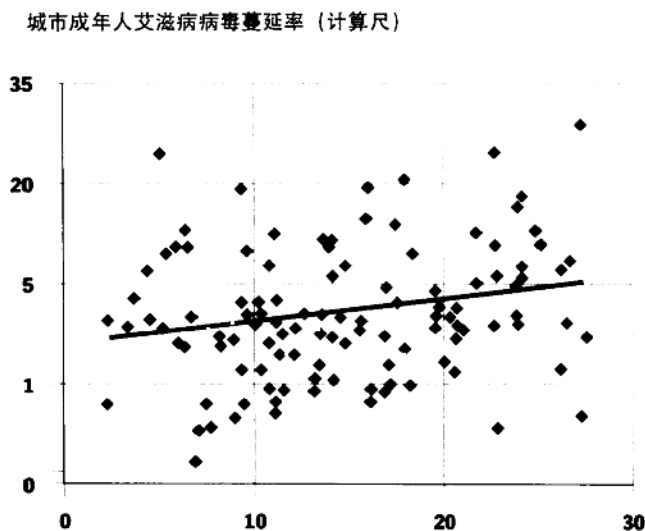
注：所有地区的数值都是人口加权平均值。

来源：最新《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的免疫数据；世界银行（1999d）人口数据。

- 更高的家庭收入不仅与母亲的学校教育相辅相成，还与孩子更高的存活率和更好的营养密切相关。孟加拉国、巴西和科特迪瓦的研究显示，妇女掌管家庭的额外收入比男子掌管要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刻板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给予妇女有限的劳动报酬，限制了妇女争取更高收入的能力。

- 学校教育和城市工作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加速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图5）。艾滋病在下个世纪会传播得更快，直到四分之一妇女和五分之一男子被感染。这种情况已经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几个国家发现。

图5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与社会性别文化程度差异成正比



男女文化普及率差距（百分点）

注：图块包含 72 个国家（32 个属非洲次撒哈拉地区，20 个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5 个属亚洲，4 个属中东，1 个属工业化国家）。衡量感染艾滋病病毒城市人口百分比的竖轴已经转换成计算尺。各图块中的点表示不考虑回归分析中社会变量作用的情况下单一国家的数据（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收入不平等指数、宗教、国外出生人口比例）。

来源：Over 1998。

- 不同年龄阶层的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常常要忍受社会性别差异的冲击，而男子也不得不为社会性别模式和规范付出代价。近年来，在东欧经济过渡时期，男子的寿命呈绝对下降趋势。男子死亡率的升高——和平时期记载的最高值——与急剧恶化的失业状况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焦虑紧密相关。

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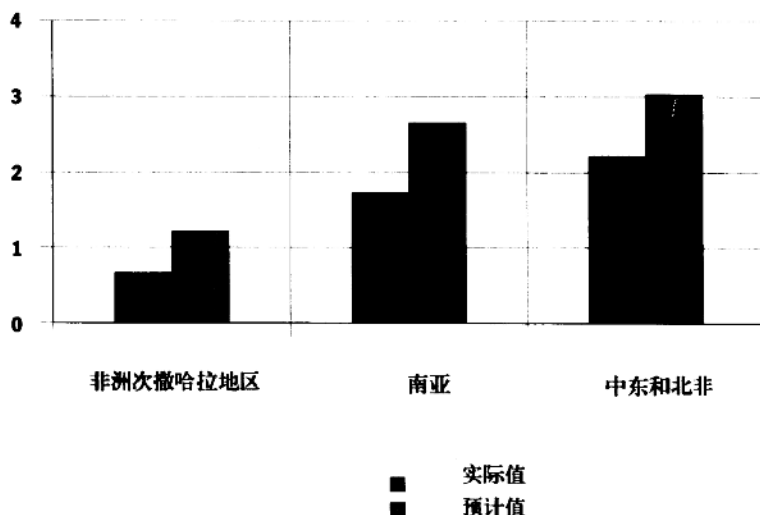
人类生活的代价是发展的代价——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性别不平等同时也要求生产力、效率和经济发展付出代价。由于阻碍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积累，并系统地排除两性对资源、公用事业和生产性活动的利用，社会性别歧视降低了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能力。

- 家庭中男女生产性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收入的减少。在布基纳法索、喀麦隆、肯尼亚等国家的家庭中，男女对投入和农业收入的平等支配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现有产量的五分之一。

- 对妇女教育投资不足同样能够减少国家收入的总水平。一项研究估计，如果南亚、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中最初的社会性别平均教育年限的差距是东亚 1960 年的水平，并以东亚在 1960 到 1992 年之间所取得的速度减少这一差距的话，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以每年 0.5 到 0.9 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实际增长率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图 6）。另一项研究估计，即使是在以较高教育水准起步的中、高收入国家，妇女接受中等教育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就会相应提高三个百分点。两项研究均考虑到有关经济发展文献中的其它变量。

图 6 加快缩小学校教育的社会性别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1960-92 年
百分比



注：“预计值”表示一个以东亚 1960 年的社会性别教育差距为起始，并以其在 1960 到 1992 间的速度递减的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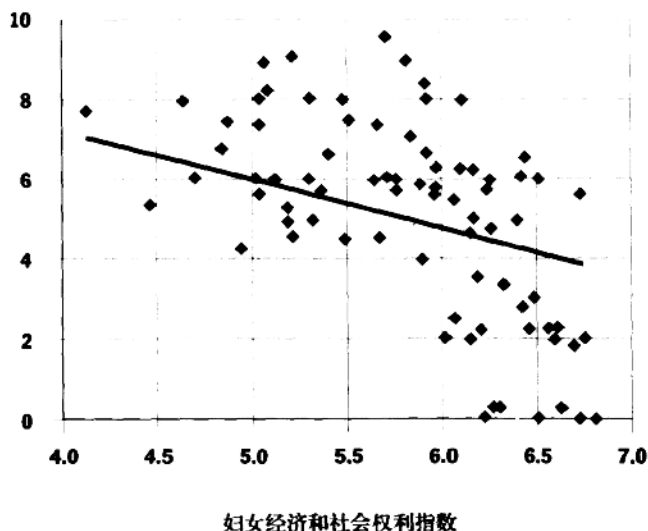
来源：Klasen (1999a) 回归分析基础上的模式。

管理

妇女权利的提高、男女对公共事务的更广泛参与跟更加廉洁的商业、政府及更有效的管理相辅相成。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越大，腐败程度就越低。这一点甚至适用于拥有同等收入水平（图 7）、公民自由、教育程度及法律制度的国家。这些结论尽管只是建设性的，但它们仍为妇女就业和参与政治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因为妇女是促进法制和有效管理的强大力量。

图 7 增加平等权利能够减少腐败

腐败指数



注：腐败指数采用《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 中的数据，并将其转换成公式：腐败指数 = $10 - (\text{ICRG 指数} - 1) \times 2$ 。妇女权利变量是 Purdue 大学全球研究项目制定的“妇女经济和社会人权 (WESHR) 指标”。数据也把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考虑在内。

来源：世界银行职员评估以及 Kaufmann (1998)。

商界妇女向政府官员行贿的可能性比较小，大概是因为她们有较高的伦理行为标准或对冒险更加反感。对格鲁吉亚共和国 350 个公司的研究显示，男子掌管或经营的公司给予政府官员的非官方报酬较女性的公司高出 10%。无论公司的性质，如行业特点、公司规模等，或所有人和管理人员自身的特点，诸如教育程度如何，这一结论都同样适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男性经营的公司行贿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社会性别不平等为什么会持续存在？

如果社会性别不平等危害人们的福祉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那么为什么它还会在很多国家持续存在？为什么有些社会性别不平等较之其它更难根除？例如，卫生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快，但政治参与以及平等享有财产权方面的进步却比较缓慢。在转换

社会性别关系和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道路上，哪些是阻碍因素呢？制度、家庭和经济。

社会制度——社会模式、风俗习惯、权利、法律——以及经济制度，例如市场，塑造男女分工及相互关系，并影响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从事的活动、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方式。制度也体现了激发或阻碍偏见的因素，甚至当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不能明确区分两性时，社会模式也可就适当的社会性别分工做出明示或暗示。这些社会制度自身存在惰性，变革的难度大，进程慢，——但远非是静止的。

像制度一样，家庭对于塑造生活开始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将这种关系沿袭至下一代起着根本作用。生活当中的很多基本决定都是在家庭中做出的——有关生育下一代、工作娱乐及对未来投资，儿女之间任务和生产性资源如何分配，应该给予他们多少自主权，是否应该寄予他们不同的期望——所有这些造成、加强或减轻了社会性别不平等。但是家家户户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决定，而是以社区为背景，其采取的方式反映出更广泛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建立的诱因的影响。

因为经济决定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许多机会，所以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在影响社会性别不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较高收入意味着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受到较少束缚，父母也就不必被迫在男孩或女孩投资的问题上进行选择。但是经济发展对两性影响的精确衡量，还取决于能够进行哪些增加收入的活动，如何组织，如何回报付出的劳动和技能，两性是否能够平等参与。

事实上，看似在社会性别方面中立的发展政策却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制度和家庭决定共同塑造社会性别分工和相互关系的方式。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社会模式和偏见、不平等的地位和资产使两性不能平等利用经济机遇——或平等应付风险或经济危机。从公正和效率两方面来看，制定政策时如果不能认识到由于区分社会性别带来的束缚，就会影响政策力度。

所以社会制度、家庭和宏观经济从社会性别角度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机会和生活前景。三者也成为公共政策能否解决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关键。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项战略

社会性别不平等迫使人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并制约国家的发展前景，因此急需采取公共和个人举措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国家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提高两性的生活状况，并通